

第一章

各种不同的设想

1991年秋季，当时担任纽约卡内基公司总裁的戴维·汉伯格和当时担任美国参议员（来自佐治亚州）的萨姆·纳恩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国际安全的未来。像所有的人一样，他们对冷战的突然结束（苏联的解体证实了这一点）感到高兴，但他们对今后的事态发展感到关切。他们特别关切的是，积累的大批武器及其技术的扩散可能产生危险的冲突模式。他们认为，美国对控制武器的扩散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应当对此承担主要的责任。他们想考虑一下这方面的含义。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扩散的具体问题同国际安全的整个条件是不可分离的；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必须考虑对现行的做法作根本性的修改。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大国之间敌对的传统模式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不仅是因为先进技术的传播使社会面临更大的危险，而且也因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改变了安全问题的性质。他们认为，暴力的扩散比传统的大规模

侵略构成了更大的威胁，驱使各国不得不为了共同的保护而进行复杂的合作，甚至那些最不情愿的国家也不得不如此。通过军事部署保持力量均势的传统概念将不得不被更为微妙的合作概念所取代。军事能力方面不可避免的差距将不得不受到明确的对等原则的限制。这些原则将由于大家共同商定的军事行动程序规则而得到加强；这些原则将不断地实施，并得到积极的监督。威慑主义是冷战产生的一个重大政策，现在它必须从属于与之对立的使人放心的思想。

这个论点设想：在国际安全的组织原则方面作出重大的改变。在现行的那种威慑的安排下，安全主要建立在军事力量对峙的基础上。如果把使人放心作为一个主要原则确立下来，那么，军事力量的对峙将被不断实施合作的规则所取代，其目的是要排除把军事力量变成直接威胁的可能性。现在实行的威慑往往不断构成威胁。使人放心的做法，就是要全面限制这种威胁，不断体现在令人信服的详细文件中。他们说，必须转而依靠这些基本原则，不仅要控制武器的扩散，而且要在大大变化了的条件下保证安全的所有其它侧面。

针对这些论调，纳恩参议员以挖苦的口吻提出了这样的怀疑：“人的本性和整个历史都对你们不利。支持你们的有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这种论调同历史的所有结果或人性的各个方面并没有什么矛盾。这两者都有许多合作的事例。的

确，如果在对立双方的军事机构内部没有某种合作形式的话，那是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的。合作可能像战斗一样，也是人类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考虑，随着情况的变化，不同活动的平衡及其应用的规模也会跟着改变。不过，纳恩参议员的问题无疑反映了过去和现在的关键所在。大多数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人，不管是直接参与者，还是关心这个问题的公民，都对蓄意进攻的可能性是非常敏感的。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确认，积极准备本国的军事力量是保护自己的唯一可靠的手段。自我标榜的现实主义学派就是采取这样的态度。他们认为，安全必然依靠国家的有组织的实力；各国出于其本性必然竞相尽可能地扩充自己的实力。由于这个缘故，坚决的现实主义者认为，任何形式的安全合作安排都不如本国的军事实力可靠。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承认，冷战的结束使情况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是，他们认为，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国家或由此产生的安全问题的根本性质。实际上，这是普遍的看法。不同意这个看法的人应当提出自己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就普遍的观点而论，拿出有力的证据始终是具有决定性。那些在别人的鼓动下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在辩论中一般总是输掉的。在这方面，现实主义学派言之有据的设想是很难被推翻的。他们的根子即使不能追溯到人类的全部历史，至少也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一些著名事件。从人类社会最早的纪录开始，战争既是组织动员

的焦点，也是政治动机的主要源泉。共同威胁所产生的凝聚力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控制领土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国家的兴起、政府的建立、军队的组建、技术的发展、制造能力的改善以及同这一切相伴而产生的人们的态度。在开发地球的过程中发生了无数战争。数以亿计的人牺牲了。这方面的经验形成了军事对峙的传统。许多人认为这是永恒不变的，正如这位参议员的问题所暗示的那样。自从有国家以来，备战和偶尔一战几乎成为所有国家的中心任务。所以普遍认为，这个模式植根于人类的本性，将无限地延续下去。

但是，安全的做法在一切重要方面并非是不变化的。眼下流行的观点虽然很重要，却不是唯一的重要考虑。它的全部含义仍然是含糊不清的，不过，越来越明显的是，现代社会在其发展中出现了重大的转向。冷战结束的方式就明显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基本上是一个自发性的事件。它几乎使所有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人都感到意外，包括那些最密切有关的政治领导人也是如此。在事态发展以前，没有一个人会料想到德国会重新统一、华沙条约会解散、苏联会解体。在这以后，人们、特别是美国自然倾向于把这件意想不到的好事说成是市场民主胜利扩展中的一个插曲。但是，应当谨慎地追问一下：是否这就是全部原因。既然任何人也没有预料到这些事件发生的时机或规模，所以没有任何人敢说理解了它们的全部后果。横扫苏联及其中欧盟国的那种巨大

变革表明，有一种非常巨大的力量在起作用，它所解决的远远不止是意识形态的争论。既然这种事态发展能够在世界的一部分发生，那么，它也可能在全世界发生。这个过程可能还远远没有完成。安全的具体含义大概不会推翻历史已经完成的一切，但是，它们可能比人们、特别是比现实主义观点的支持者想象的要广泛的多。探讨这种可能性是适宜的，甚至是紧迫的。这正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不连贯性

对于那些愿意进行这种探索的人来说，研究正在进行的整个变革自然是一个切入点，关于促成这种进程的基本力量有许多有力的线索。人们可能这样猜想：这同发生暴力的趋势有关。过去的 100 年是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一个世纪，各种形式的战争使一亿多人死于非命，物质上也蒙受了同样巨大的损失。但是，这个纪录同技术上可能造成的破坏性比较起来，则相形见绌。现代技术已经达到空前的规模，处于可能造成空前破坏的边缘。作为冷战的主要活动，军事力量的部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在数小时之内杀死数千万人，给大城市的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的破坏，使数亿人、甚至数十亿人受到严重的威胁。政界的态度容忍了这种事态发展，以至现在认为不值得注意，而随着冷战的正式结束，更是无

关紧要了。然而，如此大规模的迅速破坏的能力给人类容易发生差错的机构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简单的常识告诉我们：冷战模式的核武器部署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安全。对这种能力的处理最终是要进行某种重大变革的。

再者，大规模毁灭的潜在能力并不是非凡压力的唯一源泉。远距离精确打击的能力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施加压力了。在此以前的全部历史上，杀掉一个国王、搞掉他的总部，首先必须击败保护他的军队。而在不久的将来，随时可以从任何地点直接完成这个工作。如果这样的能力充分发展起来，并在全世界扩散，所有社会的重要资产将不断暴露在来源不明的打击之下。这种威胁的可能性意味着，如果要保护正常的日常生活，那就必须制定出先进的制约规则。

但是，实施暴力的能力的提高并不是进行社会变革的唯一的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原因。这是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其含义要比打仗广泛得多。它也以这样的背景为基础：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世界总人口空前增多——会是什么样子。不管还会发生什么别的事情，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爆炸这两者加在一起的影响就会改变人类社会的重要运行机制，造成不同寻常的压力，促成各个社会互动的新模式。这种局面可能产生许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一些截然不同的安全问题。接着而来的是战争模式的根本性变化，用现在比较婉转

的叫法来说，就是国际安全。

技 术

由于技术的根本变化而产生的历史不连贯性当然是冷战本身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不连贯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有了所谓的原子武器以后就出现了。自那时以来，它一直成为议论的话题，人们作出广泛的努力来理解它的含义。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 1945 年 9 月 11 日写给杜鲁门总统的备忘录中充分表达了这个观点：

如果原子弹仅仅是被吸收到我们的国际关系模式中的另一种破坏力更大的军事武器的话，那是一回事。那么，我们可以遵循老的习惯，保守机密和保持本国的军事优势，依靠国际上的警告，将来限制使用这种武器，就如同对待毒气那样。但是，我认为，原子弹仅仅是人类控制自然力量的新做法中的第一步，这种自然力量由于其破坏力前所未有的，太危险，以至无法适应老的概念。我认为，它的确达到了人类日益增长的技术破坏力和人类自我控制、集体控制的心理能力（即人类的道义能力）之间竞赛的顶峰。

二十年以后，爱因斯坦的一句最有名的话概括了同样的思想：“原子能量的释放改变了一切，但是没有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因而我们走向空前的灾难。”爱因斯坦所说的“一切”是指他的理论中的能量密度。在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后，便在二十年的时间内使一定数量的武器的爆炸力以数以百万计的当量增加。在掌握了弹道导弹的技术以后，就可以在洲际发射核武器，其速度比第二次世界的飞机所能达到的速度要快四十多倍以上，而且其命中率十分准确。但是，同史汀生的要求相反，这些成就被用于常规战争，被吸收到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中。两个对立的联盟形成了，它们都认为对方可能使用这种新技术，发动一场不宣而战的大规模进攻。两个联盟都花了大笔资金，准备在大规模地面进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略性轰炸中使用这些新武器。支持这些技术成就的物质计算使得我们有可能相当精确地估算出这种更加先进的战争形式的破坏性，从而对这种威胁作出一个无可争议的明确描绘。核武器影响的规模有多大，是很明显的；这就形成了以对立力量的对抗均势为基础的国际安全的概念。这个概念成为国际安全的组织公式。

如果说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是这个时期最显著的、最具破坏力的技术发展的话，但它们还不是最根本性的东西。与这些技术发展的同时有一系列有效处理信息的更加先进的技术。在五十年时间内，某些应用软件存

储、处理和远距离传输信息的成本下降的幅度以亿计，甚至比亿还要多；预计至少还有十年成本要继续下降。在早期阶段，推动这些技术成就的是武器的应用，但是，后来主要的推动力很快就转向发展消费品和许多商业性服务。技术的成果极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具有较大的扩散性，不像爆炸力的能量成百万倍地增加那么容易算得出来。不过，它们有更为广阔的发展范围。实际上，它们几乎影响到人类的一切有组织的活动形式。

虽然关于信息技术的著作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不连贯性，可以很容易同爱因斯坦所说的话融合到一起，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明确的威胁或任何其他可以觉察到的后果为政策提供组织动员力量，像核武器在冷战时期产生的那种效果一样。不过，处理信息的效率大幅度提高，这显然能够在人类社会的核心活动方面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能否做到这一点，那还在两可之间。例如，信息的广泛流动使得有可能在全球的范围内组织基本的经济活动，看来，市场的力量使人类必然走这条道路。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上，它近几年来在国际上的加速增长证明了历史的不连贯性。在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字方面，不连贯性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但是，这些数字也表明跨国界的活动日益增加。如果基本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化达到技术所许可的程度，那么，国际经济将逐步一体化，具有大大不同于以往经验的特性。

随着个人和公司学会如何使用信息技术，就业结构将迅速发生变化。由于大企业家适应了跨越不同的文化去组织生产，各种经济的民族特性也将淡化。各国政府如果去阻止这种做法，就会破坏经济业绩，它们也将无法用传统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去刺激或调整经济业绩。既然自发地一体化的国际经济将产生普遍的刺激因素和普遍的运作规则，它必将驱使各国政府在追求本国经济目标方面采取更加复杂的合作形式。它还将使各种各样的产品、信息和技术（其中有一些显然是具有危险性的）进一步扩散，加强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总之，它把每个人的命运同别人的命运空前地联系在一起。

目前，还无法绝对肯定地说，这样一种全球性经济已经出现，但这样的可能性无疑是很大的。信息的高效处理必然促成这一点。

人口爆炸

与之伴随的人口猛增的现象没有像核武器和信息技术那样引起人们从战略上加以注意，但是，它的重要性至少是同样巨大的，如果说不是更大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总人口开始加速增长，直到必须加以限制的程度为止。虽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根据标准的估计，地球上人类的总数在 1800 年首次达到 10

亿；这就是说，人类花了全部历史的时间，才达到那个规模。第二个十亿用了 125 年，第三个十亿用了 30 年，第四个十亿用了 14 年，第五个十亿用了 13 年，第六个十亿用了 12 年，在 1999 年就达到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核物理学家默里·格尔曼指出，这个序列符合抛物曲线，它在 2025 年将发展为无限远。我们知道，限制的条件将在这以前出现，限制的过程已经可以看到。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出生率正在下降。但是，从 1950 年左右开始的人口增长势头还将持续几十年。在没有什么大动荡的情况下，世界人口在 2025 年大约将达到 80 亿。人口增长的轨迹具有很大的猜测性，联合国的中期估计是，人口将最终稳定在 100 亿左右的水平上。这是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共识。

人口增长的构成同人口的规模是同等重要的。人口增长的部分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方面并不成正比例。预计中的人口增长部分几乎都发生在人口最贫穷的阶层——收入和财富分配中的最低的 20%。这个模式把比较先进的国家（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同所有其它国家区别开来。但是，同样的模式也发生在发达的国家中。在全世界比较富裕的人口中，其生育率处于置换水平或者低于置换水平。净增长几乎完全发生在收入最低的群体中。这种现象除了改变收入分配的模式外，还影响到人口的年龄结构，产生了大得不相称的年龄段群体；随着他们进入生命循环，在基本的生活要求（教育、住房、

就业、耐用消费品、保健和退休福利)方面产生了相应的升降模式。不同社会的年龄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差别,发展中国家的总人口比工业化国家的人口要年轻得多。

分配模式可能产生的后果的确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同信息技术的影响结合起来,更是如此。迄今为止,同适应信息技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增长的过程集中在先进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这是可以料想到的。那些比较尖端的、能够更多地得到资本的部门取得了技术进步,更快地学会了如何掌握由此产生的经济优势。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的。美国这个社会似乎在适应新事物方面走在最前面。二十多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好处一直集中在收入最高的阶层中。中等阶层的收入停滞不前,低等阶层的收入有所下降。从 1997 年至 1996 年,美国工资分配的最低 20% 比例中的男性平均年收入下降了 19%,而最高 10% 比例中的工资收入则增加了 10%。在这十七年中,最底层 5% 的家庭工资的相应数字下降了 11%,而最高层 5% 的家庭工资则增加了 14%。这个时期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情况大致也差不多。随着适应技术变革的过程不断前进,经济好处的分配将变得更加广泛。如果这一点不能自发地产生的话,那么,将有越来越大的压力人为地促使它产生。繁荣的金字塔的顶层呈现经济增长,而底层则是入口爆炸。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社会的团结会长期保持下去。未能产生一个比较平衡的发展模式的国家将发生严重的麻烦。而如果有

很多国家未能达到保持团结所需要的平衡标准的话，那么，整个世界将遇到严重的麻烦。

这个基本要求的经济含义是极其严峻的。简单的再分配政策是不可能产生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的。由于富人太少，而穷人太多，无法在收入或财富方面实行充分慷慨的转移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经济的增长广泛地分散开来，才能实现充分的平衡标准。从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字。由于人口基数迅速膨胀，要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就必须在今后五十年内使能源的生产增加三倍。即使效益得到空前的提高，也必须这样作。还需要使食品的生产增加两倍。这两项工作都必须在不影响环境的情况下进行，至少不要给当地的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以至无法进行所需要的增产，也不要给全球的环境造成无法忍受的破坏。在某些人口集中的地区（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目前技术的基础上能不能达到这个最低标准，也是值得怀疑的。在这个时间限度内发展另一种模式所需要的资金还没有到位。这些国家无法完全用自己的资源以这样的速度来管理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而适应这个问题的全球性投资过程还没有组织起来。

这就是新的战略环境。人类社会正在进行着影响其最基本特性的重大改造。这种改造将对公共政策的许多领域、对各种有组织的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预料中的比较显著的后果之一是，古代战争艺术经过现代

的安全做法整修以后，可能变成一些更大的目标：追求全球的繁荣、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普遍控制暴力、解决一些基本的自然过程。这就是说，为了有效地保护一个国家不受各种形式的暴力袭击，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捍卫它的利益，完成传统的使命，这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常规意义的军事力量。这些使命的完成更直接地受到这样一些条件的影响：它们历来被认为是背景条件——教育、商业投资、公共保健以及社会的基本凝聚力所依赖的其他一切条件。还可能出现新的安全问题。只要是新的，那就很难预料到。早已认识到的、可以预料的安全问题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对已经根深蒂固的安全做法作出必要的调整可能比适应完全不熟悉的安全做法更加困难。这种新形势所产生的后果的规模和延续的时间比过去要大、要长，远远超过了我们人类迄今为止所形成的机构的能力。我们简直无法理解人类社会所获得的势头的全部含义。对这个事实的许多反映之一是，没有任何一个决策机制拥有几十年经验的、前后完全连贯的远见来预见重大的战略危险或者取得全面满意的结果。人类的进取精神对其所创造的结果基本上是盲目的。

鉴于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说不是永远的话，至少也是在一段时期内，不可能出现一种有效的、被广泛接受的、取代冷战构想的国际安全新观念。当然，这种情况不会停止改造的过程。即使在完全没有明确目标

的真空状态下，这个过程也会改造冷战和更深层次的战争史的遗产，就如同冰川改造着地球的表面，或者地层以下的对流移动着大陆一样。

不可能持续下去的遗产

在这些遗产中究竟哪些最重要，哪些在新形势下受到了最大的压力；对此作出判断可不是小事。这个任务牵涉的不是简单的观察，而是有争议的解释。再者，认识已经出现的逐步适应的过程比事先预见到它，要容易得多。不过，有一些明显的看法，这些看法并不总是错误的。冷战造成了变化无常的军事力量部署格局及其蕴藏的危险性，这些危险性在对立的高潮中被压制不谈。冷战还造成了军事实力分布的不平衡和可能产生无法控制的恶果的技术扩散。这三个条件不可能同时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可以预料，一个变化无常的、不平衡的国际安全安排将受到技术扩散的影响，最终不得不重新加以设计。

不断变化是技术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結果，但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逆转的。核武器、喷气飞机、弹道导弹和信息技术大大推动了进攻性军事行动，并使之扩展到全球。当把这些创新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效地使用过的侵略性闪电战理论结合起来时，这些创新自然就成为一种部署模式，大的军事系统继续

使用它来准备突然的大规模行动。基本的看法是，主要的威胁来自侵略意图，先进的技术可以使突然袭击取得决定性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不是侵略者最终被打败，而是他们在最初阶段几乎取得胜利。

这种部署的格局产生了战争史上的新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军事机构在和平时期仅保持较少的精悍力量，只是在马上要使用时，才动员其战斗能力。冷战的格局出现后，战备的标准定得比较高，而且基本上实现了。可以这样说，对陆军和海军来说，更加先进的模式是逐步扩展对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完成的东西。但是，核武器或者最先进的战术空军力量所体现的战备程度显然是没有先例的。现代核力量能够在接到权威方面的命令后在半小时内打击数以千计的洲际目标，并在几个小时内完成进攻。在常规情况下，战术空军不是在几小时内，而是在几天之内采取行动，对于大多数发生严重军事行动的地方来说，那也就是几天的事。这种能力产生了威慑力量，但也构成发动进攻的威胁。军事力量的这种格局决定性地阻止了蓄意的进攻，但也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意外事件。不管意外事件是否会发生，这种可能性造成一个严重问题，使得行动方式不得不作出重大的改变。

平衡的问题在冷战以后比冷战期间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事后来看，这显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重大因素。两个互相对立的联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过一个稳定的平

衡。苏联面对的是所有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它比不上这些国家的总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在地理方面，它也很容易受到常规武器的进攻，特别同美国比较起来，更是如此。它力求在核武器、弹道导弹的发展和部署方面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在战术空军的发展和部署方面，同对手一争高低。可是，它在信息技术的关键领域赶不上对手，在完成更为尖端的指挥功能和从事高精度作战的能力方面逐渐落后了。再者，苏联防务努力的重负严重地扭曲了经济的构成，造成了经济业绩的危机，最终葬送了整个政治制度。

表格 1-1 1998 年对军事能力的投资

国 家	年度投资 (十亿美元)
美国	90.3
北约 (不包括美国)、日本和韩国	61.9
俄罗斯	4.8 - 15.0
中国	3.7 - 15.0
伊拉克	< 1.0
北朝鲜	< 1.0

来源：作者的估计是依据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军事平衡 1998 - 1999》、罗伯特·赖肖尔编辑的《确定国家的重点：下个世纪的预算选择》一书中约翰·斯坦布鲁纳和威廉·考夫曼写的《国际安全的重新考虑》。关于美国投资的数字取自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军事平衡》第 158 页。北约（不包括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投资，估计占国防总开支的 30%。关于中国和俄罗